



JUJIAO
ZHONGGUO
WAIJIAO

聚焦中国外交

傅耀祖 周启朋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聚焦中国外交

傅耀祖 主编
周启朋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年·北京

责任编辑:李禄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聚焦中国外交/傅耀祖、周启朋主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12
ISBN 7-80136-492-9

I. 聚… II. ①傅…②周… III. 外交—概况—中国 IV. D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6031 号

聚 焦 中 国 外 交

傅耀祖 主编
周启朋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9723 信箱 邮编:100029

地址:北京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 10 号院(北门 10 号楼)

电话:(010)64946059 传真:(010)6496801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春雷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6.125 印张 380 千字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ISBN 7-80136-492-9/K · 424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光辉 50 年	塑造中国外交新形象(代序)	1
第二章	高瞻远瞩	邓小平指点中国外交展宏图	15
第三章	阴缺晴圆	中美最惠国待遇回合	46
第四章	唇枪舌战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	82
第五章	棋逢对手	人权委员会的较量	103
第六章	“上下求索”	加入世贸组织的历程	142
第七章	一言九鼎	负责任的常任理事国	174
第八章	千金承诺	驱散核扩散阴云	209
第九章	共同繁荣	亚太经合前景可观	256
第十章	安全合作	东盟地区论坛方兴未艾	281
第十一章	新型模式	中俄哈吉塔五国协定	310
第十二章	恩怨邻邦	一波三折的中日关系	337
第十三章	互补互助	中欧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起步	374
第十四章	百年沧桑	香港回归一国两制	399
第十五章	华夏一统	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和 各种形式的台独	441
第十六章	任重道远	跨世纪总体外交展望	467
编后话			511

第一章

光辉 50 年 塑造中国外交新形象(代序)

50 年前的 10 月 1 日是全国各族人民永远铭记心中的光辉节日。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参加开国大典的 30 万群众热烈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诞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创建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从这一天起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同奋斗,披荆斩棘,开拓进取,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艰险,经过 50 年的奋战,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胜利,取得了外交工作的巨大成功,在世界上塑造了热爱和平、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外交的新形象。

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凌。周恩来总理在 1949 年 11 月 8 日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曾指出:“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

外交史。”^①为了创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1949年初,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②,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使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面前真正站立起来。当年春天,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外交基本原则,结合中国外交的具体情况提出包括“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等一系列外交方针。在这些方针指引下,新中国的外交旗开得胜,首战告捷,在不长的时间里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为创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奠定了新的基础。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是新中国外交的核心和基础,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外交实际确定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先后列入我国的《共同纲领》和几部宪法之中。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卫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略政策。”1954年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载明:“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为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改革开放后,1982年制定的新宪法更为明确地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

① 《周恩来外交文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

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50年来，中国认真贯彻执行了上述外交政策，为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为保障和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外交50年的发展历程，随着时代特征、国际总体形势和我国所处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我国外交政策调整，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前30年和后20年两个时期。前30年我国面临的是两个超级大国对我国独立、安全的直接威胁，我国的外交重点放在先是同美帝国主义，后是同苏联霸权主义作斗争，通过斗争捍卫国家的主权，维护世界和平，并全力支持亚非拉人民的反帝、反霸斗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上。后20年，由于时代主题的转移，两霸的衰落，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的国际环境有所好转，因此我国的外交战略相应作出调整，在国际事务中强调和平与发展。既坚持反霸斗争，又注重国际合作，从而使中国的外交开创了一个新局面。联系50年来中国外交战略的不断调整，中国外交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从建国到50年代中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尖锐对立，美苏冷战全面展开，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美国从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对新中国进行政治上遏制、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包围，妄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中国决定实行“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公

开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政治上互相支持，经济上互相合作。1949年1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加强了中苏两国全面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这同时，新中国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联合被压迫民族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首先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为增进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与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中国积极支持召开万隆亚非会议，并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气势汹汹地从朝鲜、印支和中国台湾三条战线上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中国政府和人民不畏强暴，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抉择，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共同作战，把自恃装备优良，直逼鸭绿江边的美国军队，打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于1953年7月签署朝鲜停战协定，粉碎了美国侵吞朝鲜和威胁中国的图谋。同时，中国人民全力支持印度支那人民进行抗法斗争。1954年4月，中国首次以五大国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排除美国干扰，恢复了印支和平，从而稳定了中国南北边境的局势。

经过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新中国站稳了脚根，巩固了独立，维护了主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争取了有利的国际条件，同时也促进了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

二、从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末期

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由于苏联坚持大国主义，对外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力图控制中国服从其战略需要，致使中苏关系由友好趋于恶化。进入 60 年代，苏联领导集团肆无忌惮地推行霸权主义，甚至不惜以战争威胁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从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到挑起边境冲突，以至发生珍宝岛事件，导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美苏两国南北夹击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决顶住了美苏两方面的压力，在外交上采取着重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同时也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的战略。

在这个时期，中国把亚非拉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中国坚持睦邻友好政策，同许多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和华人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并继续大力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956 年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1959 年古巴革命，1964 年巴拿马人民要求收回运河主权，1967 年阿拉伯人民抗衡以色列的武装侵略及其他亚非拉国家的反殖、反帝斗争，都得到了中国的大力援助。特别是 1963 年底到 1964 年初，周恩来总理对亚非 13 国的访问，提出了中国对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对增进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合作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这同时，中国还以“以民促官”的方针，同日本、西欧等国开展民间外交，发展友好交往。1964 年 4 月中日达成互设联络处的协议，促使中日关系进入半官半民阶段。1964 年 1 月实现中法建交，打开了中国同西方大国建交的大门。同年 11 月和 12 月，中国同意大利和奥地利也建立贸易机构，在美

国长期封锁中国的锁链上打开了缺口。

这个时期，中国外交在国内外严峻形势下，顶住了美苏两国两面夹击的压力，突破了美国长期遏制中国的局面，掀起了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高潮。到60年代中期，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近50个。

三、从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

这一时期，美国由于深陷侵越战争的泥潭，国力削弱，内外交困，不得不收缩力量。苏联则趁机增强军事力量，加紧向外扩张，竭力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美苏争霸态势已由美攻苏守变为苏攻美守。美国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争霸，谋求从越南“脱身”，转而同中国接近。而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成为对中国安全 and 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中国为了摆脱同美苏同时对抗的局面，集中力量着重抵抗苏联的威胁。

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调整对美政策，从乒乓外交，到基辛格秘密来华，直至尼克松总统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亲自来华访问，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打开了中美两国交往的大门，也为中国外交开拓了大踏步前进的新局面。中美关系的改善，在国际上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议。中国的国际交往迅速扩大，到1979年底同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已达120个。

苏联在珍宝岛事件后，对中国的威胁有增无减。中苏边界谈判历时9年，毫无进展；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的军事部署仍在加强；苏联还积极支持和鼓励越南侵柬反华；1979年苏联又出兵入侵阿

富汗，形成北西南三面威胁中国的态势。有鉴于此，中国决定不延长名存实亡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着重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顶住了苏联威胁。

四、从 7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后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邓小平适时作出了世界大战可能避免，世界和平可以维护的科学论断。他指出：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外交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其主要目标：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根据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国改变了“一条线”战略，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一方去反对另外一方；对一切国际问题的处理，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从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国谋求同美苏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改善和发展相互之间的关系。

为了适应世界多极化和国家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强调国与国的关系不应当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中国积极倡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推动国际形势向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建设的需要，遵照邓小平的决策，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以加快中国经济建设，实现四化的战略目标。

同时，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

制”的构想，先后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进行谈判，并分别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恢复在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一洗旧中国的耻辱，也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极好的思路。

五、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期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终结，各种力量重新组合，矛盾错综复杂，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两大趋势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根据形势变化，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克服困难，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开拓进取，进一步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1989年6月，中国平息了北京的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顾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采取一系列措施对中国实行“制裁”，施加压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外交面临建国以来少有的严峻局面。中国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出发，坚决顶住压力，与之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按照坚持原则、利用矛盾、多做工作、打破“制裁”的方针，冲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维护了中国安定团结的局面，先后同西方国家恢复了正常关系。这不仅粉碎了西方国家“以压促变”的图谋，而且壮大了中国的实力，促使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1989年9月开始的东欧剧变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所

产生的强大冲击波，影响涉及整个世界，中国首当其冲。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中国外交遵照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反对西方国家“制裁”的同时，中国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进一步发展了同周边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90年代，中国领导人多次访问东盟国家，同它们建立从全面对话到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同时，中国领导人多次访问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类似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国外交的立足点。

对剧变后东欧国家和解体后的原苏联各个共和国，中国政府表示，愿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并继续保持中国同东欧各国和原苏联地区独立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中国和俄国及有关中亚国家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营造了一条和平友好的边界。随后又同俄罗斯从睦邻友好进而建立了“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随着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同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关系逐步改善和发展，而今中国同西欧、日本正在积极建立和完善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框架。

面对各国争相进入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的现实，美国也不得不对中国实行全面接触政策。1997年10月和1998年6月，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实现互访，把中美关系推入新的发展阶段，两国宣布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进一步排除干扰，推动中美关系向正确轨道发展。但为时不久，美国为推行其称霸全球的图谋，伙同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狂轰滥炸，并悍然袭击中国驻南使馆，以霸道

反人道，以霸权践踏人权。经过南联盟和中国的坚决斗争，国际社会多方努力，终使对南轰炸结束，各方回到谈判桌上来。

与此同时，中国的多边外交也出现了新的局面。中国认真负责地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对推动重大地区冲突公正、合理的解决发挥了独特作用。中国全面参与裁军活动，积极推动裁军进程；并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活动，促进国际发展与合作。

随着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和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门回归，台湾同大陆的关系也有新的发展。台湾当局分裂祖国的叫嚣绝不会得逞，祖国统一大业迟早要实现。截至 1999 年 3 月，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 161 个，同中国发展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国家和地区达 220 多个，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回顾半个世纪来中国外交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光辉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大致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外交上一直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曾庄严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周恩来也曾指出：“我们对外问题有一个基本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独立自主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而取得的基本权利，维护得来不易的民族独立，在政治上独立而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经济上自主而不依赖外援，这是我们决定外交政策，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区别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根本所在。80 年代以前中国维护独立自主权利，突出反映在对美、苏两国霸权主义的坚决斗争上。80 年代以后，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并根据现实需要，明确

提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更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它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对任何国际问题，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不参加任何集团，从而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第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需要，它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的。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强调，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需要几十年的长期努力，因此我们需要和平，时间越长对人民越有利。邓小平指出，“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①。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一切活动只能是为了和平的目的，而不能是任何其他的目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直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它们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妄图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千方百计地利用台湾、西藏和人权等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纲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不参加军备竞赛，不搞军事集团，不进行军事扩张，永不称霸。中国坚决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内外政策，任何外国不得干预，在国际共运中不扛旗，在发展中国家中决不当头。我们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它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

第三，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同占世界总人口 3/4 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过去有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6 页。

共同的历史遭遇，现在又面临维护和平及谋求发展的共同任务。因此，中国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政治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不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邓小平非常重视发展中国家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发展问题就是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强调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这不仅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巩固独立，发展经济的斗争，进一步增进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从而使中国外交的立足点更加稳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在50年代初提出来的一项有深刻国际影响的国际关系准则，在提出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一准则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根本出发点是：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友好合作、和睦相处。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干涉别国内政。进入80年代后期，中国进一步提出，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好坏，主张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不断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发展所面临的挑战。80年代后期，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即世界多样化和多极化趋势的需要，中国政府又根据邓小平的倡议，积极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认为所有国家都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所有国家都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经济、科技、文化上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

第四，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建国之初，毛泽东就决定实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对外经济合作方针。周恩来明确指出：“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发展经济一方面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靠国际交流。”按照这一方针，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飞速发

展。但后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和苏联施加经济压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极左思潮，使中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濒于停顿。进入 80 年代以后，邓小平把对外开放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积极开发对外经济合作，不断加深同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多边活动，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按照平等互利原则促进发展，以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五，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是中国外交的基本主张。世界是多样性的、矛盾的整体，难免产生分歧和争端，中国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稳定国际关系大局出发，用和平谈判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建国以来，中国一贯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进入 80 年代以后，这一原则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邓小平指出：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还是非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解决。中国按照这一新思路，积极谋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国坚持“一国两制”，同英国和葡萄牙妥善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谋求同有关国家解决南海争端或类似争议。中国还倡导新的安全观念，通过平等参与、协商一致的合作方式，解决国际与地区安全问题。

新中国的外交，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树立了独特的风格：(1)独立自主，自强不息；(2)坚持原则，求同存异；(3)实事求是，以理服人；(4)原则坚定，策略灵活；(5)仗义执言，不畏强权；(6)开拓进展，求真务实；(7)平等待人，不卑不亢；(8)信守承诺，说话算数。

中国外交的上述特色和风格，不仅保证了圆满地完成中国外